

戴笠其人

沈 醉 文 強 著

文史資料出版社

戴笠其人

沈 醉 文 强

(修订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 史 资 料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北京

戴笠其人

沈醉文强

(修订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frac{1}{16}$ ·印张：8 $\frac{1}{2}$ ·字数：154,000

1980年8月第一版·1984年10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466,200—816,200册·定价：0.90元

统一书号：11224·7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曾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工作多年，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家世、兴起经过以及如何勾结帝国主义迫害人民的种种黑暗内幕予以揭露，使人们可以从中看到蒋介石法西斯统治集团的暴虐罪行，从而知道新中国来之不易。

目 录

我所知道的戴笠	沈 醉 (1)
(一) 家庭情况	(2)
(二) 抗日战争以前的片断情况	(5)
(三) 国难当头, 大交鸿运	(20)
(1) 从上海溜到重庆	(20)
(2) 反共起家的罪恶史	(28)
(3) 执行蒋介石“曲线救国”政策的内幕	(60)
(4) 引狼入室, 美蒋特务合流	(69)
(5) 戴笠的三件宝——学生、手枪、汽车	(85)
(6) 无孔不入的特务组织	(101)
(7) 欺下媚上的作风, 利用笼络的手法	(110)
(8) 奢侈豪华与荒淫的私生活	(135)
(四) 抗战胜利以后情况	(151)
(1) 抢劫胜利果实, 争夺名誉地位	(151)
(2) 恶贯满盈, 死于非命	(163)
(3) 死后余波, 军统结束	(173)
戴笠其人	文 强 (177)
(一) 戴笠及其家人	(177)
(二) 戴笠的起家及其发迹	(179)
(三) “以得间为主”和“五字诀”	(186)

(四) 从“跑单干”到拥有“衙门”	(193)
(五) 与胡宗南、汤恩伯的密切关系	(207)
(六) 爬上顶峰的经过	(218)
(1) 利用抗战抓武装力量	(218)
(2) 坚辞中委不就又是怎么回事	(219)
(3) 复兴社的阴魂不散	(221)
(4) 戴笠与李士珍的争夺战	(225)
(5) 对帮会的争夺	(228)
(6) 中美合作所的出现	(231)
(7) “曲线救国”的内幕	(235)
(七) 戴笠的“五抓”	(238)
(1) 抓肃奸大权	(239)
(2) 抓外事大权	(241)
(3) 抓化整为零的合法地位	(243)
(4) 抓东北新天地	(244)
(5) 抓遣送日侨俘的幕后活动	(246)
(八) 戴笠死前的几件事	(248)
(1) 大打内战的阴谋	(248)
(2) 勾结柯克上将的一幕	(250)
(3) 蒋介石一通电报引起的惊慌	(251)
(4) 以退为进的对策	(254)
(5) 戴笠死后拾零	(256)

我所知道的戴笠

沈 醉

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他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一贯政策：在为蒋介石排除异己、保卫反动政权，以及保护蒋介石的安全等方面，可以说用尽了他生平所有的力量。无怪他生前能得到蒋介石的格外垂青，宠爱备至；死后使蒋介石特别感到伤心，亲自一再为他选择墓地。主仆之间，关系之深，实非一般可比。

关于戴笠一生所作所为，我知道得不很多。虽然我从十八岁便参加了他所领导的特务组织，前后十八年中，在他身边担任总务处长达四、五年之久，但由于他一贯阴险狡诈、变化多端、性情反复无常，使人不易捉摸，因此写述他的有关材料，不但遗漏必多，而且在他作风、性格等方面，也不能

象其他人物一样易于掌握。他待人接物有几副不同面孔、不同方式和不同方法，往往使甲所见与乙所知不尽相同，甚至恰恰相反。为了揭露这个特务头子的滔天罪行和军统特务机关的黑幕，现将我过去所直接了解到的，和种种传闻中比较可靠的一部分写出来。由于没有档案可资稽考，仅凭个人记忆，事隔多年，遗漏与错误在所难免，尚希知情人士补充指正。对于军统整个组织人事、罪恶活动、军统所办的八十多个特务训练班的具体情况和数以千百计的军统所控制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详细情形，以及军统和戴笠怎样运用与防范叛徒等材料，准备另写，这里只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扼要地叙述，以便把写述的重点集中到戴笠身上。

(一) 家庭情况

戴笠，字雨衣，小名春风，一八九七年夏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硤口镇，幼年丧父。兄弟两人，弟名云霖。母为一个很能干、勤朴的农村妇女，善于操持家务。戴笠很少向人提到他父亲情况，却经常对人称赞他母亲如何能干。特别是我任军统总务处长期间，他不下十余次向我谈过他母亲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种种经验，要我向她学习。抗战前，戴笠在南京时，他母亲曾住在鸡鹅巷五十三号（他办公和会客的地方）进门左边平房内，我经常见到她，她性情温和、慈祥。戴笠每次对勤杂兵拳足交加地殴打时，他母亲必出来制止，并抚慰被打的人。戴一向以孝顺母亲来标榜自己，但是抗日战争

发生后，却把母亲送回家乡，浙江沦陷前也没有接出来，他又以此来标榜自己“为国而忘家”的精神。胜利后，他才回去看望过他的母亲。他自己虽然挥霍无度，但对母亲的用费却限制很严，生怕他母亲在家乡购置田产。为了表示自己清廉，曾一再叮嘱不许背地里将军统经费拨给他母亲。我去见他母亲时，她告诉我家里的钱常不够用，因为经常有些同乡和戴笠的旧部找她要钱，并且还要替戴笠养几匹马，每月开支很大。直到戴笠死后，她还健在。大家将戴笠死讯一直瞒着，而骗她说戴笠出国去了，她也信以为真。一九四九年初她才死去。

戴笠于一九一四年和同乡毛应升的女儿结婚。她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曾在南京鸡鹅巷住过，对人很和蔼，没有什么架子，与戴母一同和当时在鸡鹅巷办公的特务一桌吃饭。戴笠最初和她感情还好，以后便不大理她，不但不与她一同吃饭，甚至连办公室都不准她进去。她也毫不在意，抗战开始前和她婆婆一道返回家乡，抗战初期便死去了。

戴笠只有一个儿子叫戴藏宜，生于一九一五年。他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不但写的字相似，而且个性、习气、嗜好都相同，只读过高中，便没有再进学。戴笠对他用钱限制很严，他却想方设法凭着父亲关系到处借钱用。他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一直倚仗父亲势力，在家乡无恶不作。他在家乡办一所小学，自任校长，对在该校工作的女性，甚至连自己亲戚也要加以蹂躏。他相当怕他父亲，戴笠常用鸡毛掸子打他。他

们父子间很少见面，也极少通信。戴笠在世时，特务们对他还客气一点；戴笠死后，都对他冷淡起来。特别是在瓜分戴笠的财产时，他满以为可以趁此机会大捞一把，结果不但郑介民、毛人凤等同他发生冲突，连军统南京办事处处长李人士也为了争夺一部派克牌跑车几乎把他扣押起来。当时戴笠的棺材还停在中山路灵堂，他跑去抚棺痛哭。最后只得把这辆汽车送还给李人士，由我另外给他找了一部别克牌跑车了事。

戴笠的弟弟戴云霖也是一个军统特务，在兰州等特训班当过事务员。抗战胜利后回家乡，倚仗兄势，在地方强占人民田地、房产、妻女，无恶不作，为一方恶霸。

抗战开始，戴笠将母亲、妻子送回家乡后，便在长沙找了一个女秘书叫余淑衡（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一直带在身边，到重庆后送她进外事训练班，有意和她结婚；后又送她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并把她的母亲和弟妹等一起从长沙接到重庆军统磁器口缫丝厂办事处居住。戴对这位未曾公开的岳母很好，经常去探望；躲警报时，也特别指定在他专用的防空洞内。

余淑衡在美国几年中，传闻她已另有对象，迟迟不想回国。而戴笠自一九四三年与老牌电影皇后胡蝶秘密同居以后，也渐渐忘记了余，落得她不回来，免得多惹麻烦。

戴笠对胡蝶可说一见倾心，格外欢喜。他自有了胡蝶以后，对于玩弄其他女性的兴趣也减少了一些，因为胡蝶很有一套笼络手段。当时胡的挂名丈夫潘有声，自从老婆被戴

笠看中而占有之后，他在特务淫威胁迫之下无可奈何。他知道不这样做，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枪弹穿几个窟窿。当戴笠答应给他一个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名义，让他放手去做投机走私生意时，他便长期住在昆明，很少到重庆去和胡蝶会面。抗战胜利后，戴笠还准备叫胡蝶正式和潘有声离婚而与他公开结婚。后来因为他从北平回上海时坐飞机摔死了，潘有声才带着胡蝶去香港当寓公。关于他同胡蝶的事，后面详作交代。

（二）抗日战争以前的片断情况

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他虽不擅长骑马，却很欢喜马。因他面带马相，特别是有严重的鼻炎，时时流鼻涕，很象马一样成天哼个不停，每日要用很多条手帕擤鼻涕。他很迷信“人的面相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别人当面说他举止和马一样，他也不以为忤，反而沾沾自喜。后来他用的化名也叫马行健，居然以马自居。他常说愿为蒋介石终身效犬马之劳，他是甘心为这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充当犬马而引以为荣的。

在他没有进黄埔之前，早就替蒋介石充当特务。他先是替胡宗南做情报，以后由胡推荐给蒋介石。他经常向人谈到他过去充当无业流氓时在杭州所过的日子与在上海“打流”的情况。那时他只有一套衣服过夏天，穿脏了便在西湖内洗干净，晒在湖边，干了再穿起来。一双白帆布鞋每次花一个铜

板的白粉涂上去，又象新的一样。他在上海住在老表张冠夫（张袞甫）家中，睡在地板上。他的表嫂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以后他发迹了，张冠夫在军统当会计室副主任，他便怂恿张讨小老婆，以报往日之仇。他那位表嫂谈起这段情况时，还很气忿。

他在未进黄埔前，到处搜集一些情报，但只能在蒋介石出门时拦住汽车递上一份报告。以后到黄埔军校第六期混了一个时候，没有毕业便当了蒋介石的副官和参谋，才慢慢接近起来。当时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的胡靖安，据说还领导过他的工作，不过时间很短。以后他便和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等十人组成一伙，正式领有经费，从事特务活动。这便是以后军统所称的“十人团”。这十个人不久又有些人离开了去干别的工作，如黄雍、马策、郑锡麟等人。以后除黄雍未再回到军统工作外，马策和郑锡麟又都再度回到军统，成为军统中重要骨干分子。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复兴社设立特务处，戴笠任处长。以后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由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任副局长。特务处改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戴笠任处长；第一处则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三处由丁默邨、金斌先后任处长，主管邮电检查（后改称特检处，战后拨归军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成立，原来徐恩曾领导的第一处全部人员均到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去。戴笠将第二处扩充为

四个处（即军统）。由于戴笠资历不够任局长，蒋介石怕别人不服气，便指定他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兼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戴笠的特务系统才算正式形成。这时他便放手发展组织，扩充地盘。蒋介石只派郑介民当他的副处长和一个主管会计工作的徐人骥，其他的人员都是他自己慢慢找来的。所以他在军统中一向以家长自居，特务们都称他为“老板”。约在一九三四年前后，蒋介石手下另一特务头子邓文仪，因各方面工作都赶不上戴笠，蒋便命令邓将所领导的南昌行营调查科所属特务系统全部并入戴笠特务系统内，并由戴笠兼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戴虽然一身兼任数要职，而蒋介石却还是叫他做戴科长，便是这个原因。当时并入的邓系特务张毅夫等数十人，以后一直跟着戴笠工作。从此以后，戴笠渐渐把势力插入许多公开特务机关，先后控制了南京的首都警察厅调查课，由赵世瑞任课长；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也接收过来，由吴乃宪、翁光辉、王兆槐先后任大队长。不久，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也落入戴的手中，由翁光辉任股长。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署长也由戴笠推派吴乃宪担任。甚至当时以禁鸦片为名，实际是公开垄断贩运鸦片而筹措反共经费的禁烟督察处密查组，以及各地的一些警察局、侦缉队、各省保安处第四科（或称训练科）也都相继被戴笠所控制。当时特务们称南京的特务处为“总处”。戴笠经常爱讲总处并入陈立

夫领导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改为第二处时，他去见陈，陈对他很为藐视，使他永久怀恨在心，多年不忘。以后军统与中统一直闹摩擦，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戴笠在扩大组织的同时，还先后在南京洪公祠以及杭州浙江警官学校内开办特务训练班。南京特训班用的是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名义，由申听蝉当主任，专门找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的失业学生，施以特务训练后，交由他安排在军统内工作。军统一些特务头子如徐远举、何龙庆、陈恭澍、田动云、廖宗泽、陈善周……等都是这个训练班毕业的。戴笠是浙江警官学校特训班的政治特派员，由他选调该校正科毕业生和调动一部分特务去受训，以后成为军统中骨干分子。毛森、杨超群、萧勃、阮清源、邓墨村等都是这个班毕业的。不久，戴笠又利用康泽在庐山举办军校庐山特训班的机会，与康泽合作，在该班附设一个队，由连谋任队长，专为军统训练特务。

在这一阶段中，戴笠主要的活动是反共和为蒋介石排除异己。他利用一些叛徒如梁干乔、王新衡、谢力公、叶道信、陆海防、吴景中等替他进行反共活动和训练特务学生。而最为蒋介石所欣赏的是他那一套暗杀和绑票的工作，如吉鸿昌被刺于天津国民饭店，张敬尧被打死在北平六国饭店，都是由军统华北区行动组白世维、黄泗钦做的。特别是上海方面的活动，更为蒋介石所称赞。宋庆龄当时虽然被国民党尊为国母，但实际上却对她仇恨万分。特别是她领导的民权保

障同盟，恰恰是针对蒋介石那种蔑视人权、任意捕杀人民最有力量的组织。蒋介石虽然多次想下她的毒手，恐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一直迟迟未敢行动，只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她所居住的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住宅的前后进行监视，有时由特务们写信或打电话去恐吓、侮辱。宋庆龄不但不曾被这些无耻的卑劣行为所吓倒，反而更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最后，蒋介石便决定叫戴笠派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于一九三三年六月间将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离宋住宅不远的亚尔培路，企图以此威吓宋。戴派人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沪杭公路上，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及其长子史咏赓的同学和汽车司机打死在海宁附近。全车四人，仅史咏赓逃脱未遇害。目的是用以威吓上海方面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行动组还经常在上海逮捕绑架中共人士，破坏中共组织。中共江苏省委王克全和不少中共党员先后被捕。第三国际远东区负责人华尔敦（不明国籍，当时报上称之为怪西人案，因他被捕后一句话也不说）及其秘书陆海防，与有关人员程其英、陆独步、袁殊、王莹等被捕后均由戴亲自审讯，并以种种威胁利诱方法逼供。另外他还经常命令上海行动组在英法两租界内用绑票方法，秘密逮捕中共领导人员。当时英法租界内是不准反动政府任意进去逮捕居民的，但只要事前通知他们会同一道去搜捕共产党，即使是深更半夜，那些外国包探长都会特别表示欢迎，也随时答应准许“引渡”。由于要通过这一手续，

而且公开以后，报上要登出消息不易继续发现新的线索，特别是帝国主义者还想从这些人身上找出一些关系，所以戴笠非不得已，不主张正式通过租界巡捕房去搜捕革命人士，而爱直接采取绑票方法，达到目的，因为这样做对他的工作更利些。一九三三年四月，我记得有一次在法租界蒲柏路、吕班路口蒲柏坊准备绑架一位中共负责人，因内线指错了人，而误将一个以赛马为职业的骑马师绑走，一直送到南京才发觉绑错了。后来将错就错，错了也一样囚禁起来不放，因为怕他放出来会泄漏秘密，一直糊里糊涂囚禁到抗战发生、南京撤退时才行释放。还有一次是在英租界越界筑路的曹家渡附近去绑一位中共领导人，这人住在越界筑路的一所房子里，当他发现情况时，就从后门跑出去。这些人既是绑票匪，又是反动政府的正式特务，一看他跑出了租界势力范围，便由绑票变成公开逮捕，竟开枪将其腿部击伤后捕去。象这类的政治绑票案件，在当时上海租界上是经常发生。戴笠为了在租界绑票和搜捕共产党更方便起见，便决定对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籍工作人员进行收买。我在军统上海特区担任过法租界的组长。这个组的特务当中，有一个是法租界巡捕房华探目范广珍，便是通过杜月笙的介绍参加军统的。以后戴笠还另派了一个他自己训练过的特务、黄埔六期毕业的阮兆辉，通过范广珍的关系，和五百元的活动费而打入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俾可进一步便于军统在租界内的绑票活动。

当时军统在上海绑架到的中共人士和进步人士，一般都

是立刻解送到南京军统的秘密监狱去囚禁和审讯。这个监狱的负责人是黄埔五期毕业的苏子鹤，化名顾人道。这是当时一所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监狱，专门囚禁共产党和政治犯。到一九三四年以后扩大成为两个，这时连军统和复兴社的违纪人员也同样囚禁到这两所监狱内。连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扣押的曾扩情，也由蒋介石交与戴笠囚禁过半年多。我在上海有五年多，经常解送被捕的革命人士和军统违纪特务去南京，总是由苏子鹤或特务队长许建业等到车站接我。我把人犯交给他们后，只能搭他们的便车到北门桥附近下车，从来也没有去这些监狱看过。当时是非常严密，没有直接工作关系的人是决不许知道这些监狱的地点和内部情况的。

戴笠在早年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劲敌，是在上海活动的安徽帮帮会首领王亚樵。这个人有一群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专干绑票、暗杀工作。以后一些反蒋的人士便利用他这一组织，进行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先后在庐山和上海法租界发生过谋刺蒋介石而未中的事件，便是由他主持的。其中规模最大、布置最周密的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在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开会时于中央党部内谋刺蒋介石未成而击伤汪精卫的事件，也是由王亚樵受了反蒋人士的委托而干出的。他们先在南京组织一个“晨光通讯社”，趁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以记者身份混入会场，手枪则放入照相机内（因为这样才容易混过）。那次照相时，蒋介石恰巧没有参